

文化中国
天地日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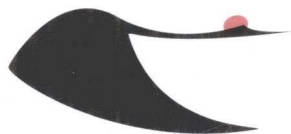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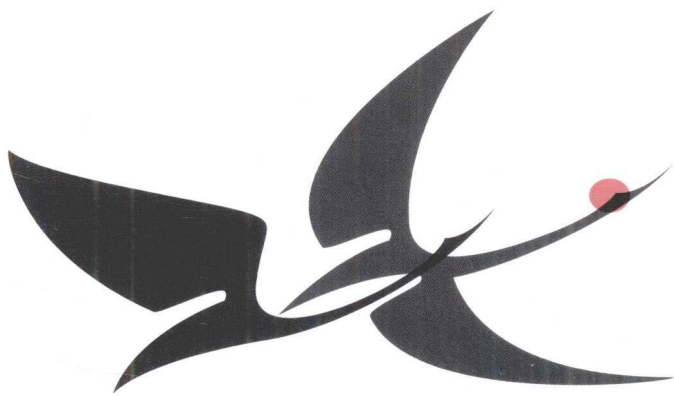


中国人的理想国

几千年来的中国思想史，正是中国思想家坚持理想，批导现实、转化现实、提升现实的总记录。

黄俊杰

主编



黄山书社

本书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授权出版发行简体字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的理想国 / 黄俊杰主编. ——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12 (文化中国丛书)
ISBN 978-7-5461-2476-6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哲学思想—研究—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5245 号

中国人的理想国

黄俊杰 主编

出版人: 左克诚

责任编辑: 郑实 刘翔

责任印制: 李磊 赵彬

装帧设计: 范晔文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邮编: 230071

策划: 香港三联书店北京工作室

发行: 北京时代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电话: 010-6551362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 010-61202350

开本: 710×1050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33 千字

版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1-2476-6 **定价:** 38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林载爵

这一套“文化中国”丛书原来是以“中国文化新论”之名，于1982年10月在台湾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总共12册，将近4000页，约400万字。这套丛书讨论了10个主题，包括：文明的根源、思想、文学、科技、制度、经济、学术、社会、艺术、宗教礼俗。以118个题目全面性的讨论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各个层面，组合成一幅比较完整而丰富的中国文化图像。撰写者一共96位，网罗了当时年龄约30到40岁的青年学者，反映了1970年代以来台湾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的反省与思考，构成了中国文化再诠释的新篇章。这些学者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几乎都位居台湾学术界与文化界的重要位置，当年所发表的论点今天仍然具有新意，可以提供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视角。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在受到西方文化长期的冲击以及连带对传统文化进行无情的批判之后，好不容易终于体认到传统与现代是连续性的整体，不可分割断绝。因此，一部超越传统的论述，适合于当时处境与需要，又有系统的中国文化史论著，显得十分迫切。其次，中国文化在1970年代的华人世界需要重新被检视，而台湾则是一个恰当的

地方。台湾的学生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在大学又接受了西方式的学术训练，西方汉学家或台湾出身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的历史学者，不断在台湾传播新的观念与思维，他们给台湾学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到1970年代，这样一批受到西方式现代教育熏陶，对传统中国文化又有新见解的年轻学者已经在台湾出现，成为台湾学术界的一股新兴力量，他们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自然有着不同的视野与不同的解释。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将他们集合起来，总体呈现一个全然有别于过去的中国文化的新观点与新解释。

于是，《联合报》的创办人王惕吾先生以他所设立的“文化基金会”资助了这个庞大的出版计划，目的就是要“提供一部丰富新颖、流畅可读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撰述者之所以以年轻一代的学者为主，最重要的原因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呈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三十年台湾文史教育的成果，并且深信年轻一代学者以其所吸收的西方知识、所接受的近代治学方法训练，必能对传统文化提出新的解释观点。

从历史背景来看，1975年是台湾思想发展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林毓生教授首度返台任教，开启了一批想要获得更精密的思想方式的青年学生的视野。他在这一年的5月发表了一篇长文：《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点燃了沉闷气氛下青年学生重探狂飙年代的兴趣，与领会思想问题的不同讨论方式。同年年底，余英时教授发表了《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文章中深入而前所未见的观点，让青年学生发现思想的新世界，这个世界辽阔无边，只要运用理智的思考与分析，加上一些想象力，便可展翅飞翔，一股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开始出现。

隔年，1976年，余英时在《联合报》副刊上陆续发表《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术发微》等文，为当时争论不休的“专制”问题提出了中肯而又有说服力的解释。9月，余英时将上述文章及其他论著结集为《历史与思想》，由联经出版，这是余英时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产生极

为广泛的影响。

不论林毓生或余英时，在讨论问题时都不时引用当代西方学者的观点，对台湾青年学生带来极大的刺激。此后，翻译现代思想名著成为几家出版社的共同职志，知识青年在这方面所表现的求智渴望，是1970年代末期台湾文化界极为突出的现象，这是一个思想燃烧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中，知识青年一方面向西方看，一方面又回望中国传统文化，企图让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受到批判之后赋予新的解释，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中国文化新论”就是这个组合的产物。

这套丛书的编撰过程也有其新颖之处。一般丛书的编撰，惯例上都是汇集单篇论文而成，这一次突破了旧有的方法，从开始就采取了以研究讨论为基础的共同参与方式。自丛书的主题、篇目，各篇间的相互关联，以至各篇文章的论旨，都经过每册作者讨论后才决定。初稿完成时，也经过切磋、问难，然后，再次修改定稿。所以，这套丛书并非过去旧有形式的论文集，而是具有主题、结构的集体创作。

有关文化史的研究，不论通史式的概述或断代式的专论，都不可避免的有其缺失。概述易省略其深奥与意涵，专论易疏忽其源流与发展。这套丛书则采取以问题为主的研究，完全根据问题的性质，或贯通而观，或断代而论。这种研究方式，保留了方法上的极大弹性，同时，也更容易彰显问题本身的性质，提出更周全的解释。以关于文学的两册为例，一册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间情爱的关注、幻想与神话，到智与美的融合，一共设计了六项我们认为能够充分表征中国文学传统的主题，给予系统性的解说，并讨论了文学的形式与意义、抒情精神与抒情传统。另一册则分别就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宋诗、咏怀、咏物、小说、戏剧等重要的文学类别加以论述。两者配合，相信不但突破了旧有的文学史形式，而且更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学史的内容。有关学术的一册，问题的选定则侧重每个时期的不同成就，从学术的萌芽到经学、注疏、理学、考据学，一一论列，以见学术的发展。关于制度与艺术的卷册则又注重各个不同的部

分或类别。制度的一册里讨论了皇帝、宰相、监察、选举、考试、史官、地方行政、君主教育等官僚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并申述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与历代政治改革的理想。关于艺术一册的内容包括了美学思想、青铜、玉器、陶瓷、雕塑、书法、绘画、文人生活工艺品、建筑等重要部分。

这套丛书既然是以问题为主的研究，自然而然，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一则反映了年轻一代学者的主要关心所在，一则想透过新问题表达新的解释观点。以关于思想的两册为例，讨论了忠、孝、仁、礼、公、私、仕、隐、常、变等传统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并作了新的阐释；同时也提出了理想人格、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德治与法治、儒家政治理想、法理依据、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均富理想、管制与放任、道德自主与社会约束、道德与政治、自然秩序与人文秩序、自然观念等新问题，赋予传统思想新的意义。借着尝试提出新解释，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更能显现出来。

然而，新的解释观点并非凭空杜撰而来，在这一点上，这套丛书特别强调广泛利用前辈学者的杰出研究成果，以此为根基，再作进一步的发挥。因此，钱穆、萧公权、李济、徐复观、牟宗三、杨联陞、屈万里、全汉昇、刘若愚、陈世骧、李剑农、赵冈、劳榦、张光直、余英时等等许多前辈学者的优异著作，都随时被年轻一代的学者所征引。这种现象除了说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受到年轻一代学者的绝对肯定与尊敬外，更表示了处于变动之中的中国近代学术生命，在台湾的一脉相传，其意义自是无限深远。

尽管当时两岸隔绝，但各篇文章中，凡是论及根源，都运用了最新的地下考古材料来印证解说，根据最新的地下出土文物，分别从居址、器物、食粮、国家等方面，完整而清晰地描绘了八千年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我们对先民活动起居的情形、食米（小米、稻米）吃肉（以猪为主的家畜饲养）的文明、上古社会形态的变迁、国家组织的出现，也就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特别是提出“满天星斗”

的上古文明的多元发展史观，更是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样性的了解。其他诸如讨论到地理环境、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人文思想、天下观念等问题的文章，也都能参证地下材料。

这套丛书自始即希望能涵盖较为广阔的文化活动层面。不可否认，近代历史教育过于偏重政治史，这使得历史教育的文化内涵，显得极其贫乏。这套丛书除了具备广为熟知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制度之外，更包含了以往较受忽视的社会、经济、科技、宗教、礼俗等层面。过去，对于中国科技史的了解，总是借助于英国李约瑟或日本数内清的著作，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本与科技有关的专著，这也代表着年轻一代的科技史研究者踏出了一大步。在台湾，经济史是当时的一门新兴学问，年轻一代投入这项研究工作的，愈来愈多，相关经济的这本便是这些研究者所展现的成绩，分别从农业的自然环境、农业水利、新耕地的开发、土地分配、生产技术、商业、城市、货币信用、交通、海外贸易、财政税务等十一个方面，建构一部经济发展史。关于传统宗教，也选择了几个重要的问题来讨论。特别要一提的是风尚礼俗。近代以来，在对传统进行批判时，礼俗必定首当其冲，自命新派者，即清末所谓的“文明人”，弃之如敝履。然而，这套丛书中关于礼俗的则本着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探讨了祭祀之仪、婚丧之礼、长幼之伦、以及民间节庆、娱乐的文化意义，赋予这些传统礼俗一个新的文化生命，纳入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中。

在简述这套丛书的编撰过程与内容特色后，作为当年的执行编辑，我非常高兴这套丛书在李安小姐的主持之下，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版，期待书中的观点能够对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有所助益。

2011年11月

目 录

i	总 序
	林载爵
4	导 言
	黄俊杰
10	呈显光明·蕴藏奥秘
	——中国思想中的人性论
	曾昭旭
36	德合天地·道济天下
	——先秦儒道思想中的理想人格
	蔡明田
66	天与人归
	——中国思想中政治权威合法性的观念
	张端穗
104	使民无讼·朴作教刑
	——帝制中国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卢建荣
136	追求完美的梦
	——儒家政治思想的乌托邦性格
	陈弱水
158	自由与和谐
	——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
	蔡英文
188	仕与隐
	——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两极
	刘纪曜
224	损有余·补不足
	——均富的理想
	方清河
248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经济思想中的管制与放任
	吴克
278	作者简介

中国人的理想国

黄俊杰
主编



目 录

i	总 序
	林载爵
4	导 言
	黄俊杰
10	呈显光明·蕴藏奥秘
	——中国思想中的人性论
	曾昭旭
36	德合天地·道济天下
	——先秦儒道思想中的理想人格
	蔡明田
66	天与人归
	——中国思想中政治权威合法性的观念
	张端穗
104	使民无讼·朴作教刑
	——帝制中国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卢建荣
136	追求完美的梦
	——儒家政治思想的乌托邦性格
	陈弱水
158	自由与和谐
	——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
	蔡英文
188	仕与隐
	——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两极
	刘纪曜
224	损有余·补不足
	——均富的理想
	方清河
248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经济思想中的管制与放任
	吴克
278	作者简介

导 言

黄俊杰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它不仅包括具体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经济活动、器物工艺、科学技术等外在事物，更包括抽象的精神取向、宗教礼仪、价值意义等内在活动。其中，内在的心灵世界尤其是构成中国文化内涵最充实而有光辉的重要部分。这一个内在的心灵世界自孕育、萌芽以至开展的历程，便是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自先秦以至近代，虽然一方面千折百回，颇见其阶段性之转变；另一方面则曲畅旁通，万壑争流，表现其多样性的内容；但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思想仍呈现出某种一致性，而“人文化成”的精神正是这种一致性的主要特征。南宋大儒朱子（1130—1200）在《近思录》卷二曾引《易经》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语来说明秉笔作文非圣人之要务。张伯行（1651—1726）集解云：“盖天下之灿然有章者，同谓之文。……人伦条理，各止其分，乃人之文也。君子观之，而有以成天下之化。”这一段话很可以说明“人文化成”四字的含义。用现代的语言来诠释，我们不妨说，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一项重要精神就是：思想家都面对人生的现实，以植根于对“人”的无限信心而生的理想来正面承担人生的苦难，转化并提升人生的现实。从某一个角度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几千年来的中国思想史，正是中国思想家坚持理想，批导现实、转化现实、提升现实的总记录。

中国思想传统中“人文化成”精神的表现可以从主客两方面来观察。就主体——人——而言，绝大部分的中国思想家对于人都充满了信心，认为人生而具有善的秉赋，有其良知良能；或认为人可经由教育或其他途径加以转化，去伪存诚，存天理去人欲，终能成就完美的人格。中国思想家一贯地认为宇宙的主体是人，而人具有先天的善苗或可教化之秉赋，因此，他们对于人充满了无限的信心。

由于对人充满了信心，所以大部分的中国思想家都认为：宇宙的主体（人）对于相对于人而言的客体，皆具有加以转化、提升之潜力。人是顶天立地的存在，人与宇宙间超越的存在之间具有德行上的联系；因此，人可以“上下与天地同流”。人不但不受客观环境或条件，诸

如政治权力、社会秩序或经济结构的制约，反而能够以其无限的善性与潜能来转化客观环境。这种以“理想”提升“现实”的信念，表现在中国思想的各个方面。就政治思想而言，传统中国的思想家一贯主张“道”尊于“势”，也一贯主张“德”高于“位”，认为“有盛德者必有大业”，认为外在事功的表现乃是内在德行修为的结果，而非其原因。因此，政治权威必须在道德的基础上奠定其合法之基础，而德治始终为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一条主流。相对于历史上政治的现实状况而言，这种思想很有改变现实的企图，也因此具有所谓“乌托邦”（Utopia）性格。因为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具有这种以理想提升现实的性格，所以传统知识分子在个人进退出处之际，就不免徘徊于“仕”与“隐”的两难式之间。用孟子（公元前371—约前289）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圣之任”与“圣之清”之间的抉择。就社会思想而言，中国思想家也殚精竭虑地思考“群”与“己”之间的关系，对于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如何求得妥善的安排极为措意。就经济思想来看，则均与富之间以及管制与放任之间如何求得稳定的平衡点，也是中国思想家所关怀的中心主题。总结地说，不论是政治、社会或经济等客体方面的问题，中国思想家都倾向于以主体转化客体，以主体作为思考问题的主轴，而“把人当人”正是其中心信念。

本书所汇集的九篇论文就是从主体（人）与客体（政治、社会、经济）两方面，分析中国思想家对“理想与现实的对蹉”这个问题所作思考的几个重要成果。曾昭旭先生的《呈显光明·蕴藏奥秘——中国思想中的人性论》，就是分析中国思想传统中对于人性的看法。曾先生从“分解地说性”与“存在地说性”两大范畴，对中国思想中所见的各种人性论细加分疏。蔡明田先生的《德合天地·道济天下——先秦儒道思想中的理想人格》，则进一步分析先秦儒道思想中最能表现文化精神或价值，而为人们所崇奉取法的理想人格。蔡先生的研究指出：先秦原始儒道两家思想之辉煌成就均侧重在德性文化，其理想人格均为“圣人”。儒家以使命感立世，较富理之应然义，极高明而道中庸；

道家以应化义游世，较富理之自然义，致广大而尽精微。但两者皆为入世、淑世的人道主义者。这两篇文字都触及中国思想中的“道德的主体性”这项特质，与前文所说的“对人的信心”是互相呼应的观念。

本书第三篇论文是张端穗先生的《天与人归——中国思想中政治权威合法性的观念》。张先生的研究指出：中国思想史上各家关于政权合法化的观念基本上继承《尚书》的天命观，再依思想理路的内在发展与外在环境的要求而呈现不同的变形。张先生指出：中国思想家在理论上都赞成有德者在位，但是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以血缘传承为合法的传统性统治却是常态。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是道统与治统之间冲突的原因。中国传统思想家一贯主张以理想提升现实，以道统提升治统。张先生这项看法也与第四篇论文的见解不谋而合。卢建荣先生在《使民无讼·朴作教刑——帝制中国的德治与法治思想》一文中就指出：不论是法在君上的法治思想或是防范恶君恶吏的德主法辅论，均同具理想性。这种抱道守贞、坚持理想的性格，在儒家思想中表现得尤其深切著明。陈弱水先生在《追求完美的梦——儒家政治思想的乌托邦性格》一文中指出：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流都含有乌托邦思想的性质；这种性质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也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主要难题。这个难题在儒者面临出仕或退隐的抉择之际就更形深刻化。刘纪曜先生的《仕与隐——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两极》一文就是从思想史的立场来分析“仕”与“隐”的问题。刘先生认为此一问题之发展可分为先秦与秦汉以后两大阶段。在先秦时代，儒、道、法三家在仕与隐问题上的观点与态度泾渭分明；秦汉以后，“仕”的方面有儒法合流的趋势，“隐”的方面则有儒道合流的趋势。刘先生在结论中指出：儒家信持“君臣之义”这一项事实，是他们无法化解或突破“仕”与“隐”之两难式的重要原因。这项看法与前此几篇论文正可互相发明，比观印证。

蔡英文先生的《自由与和谐——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针对自由与秩序这个问题，来剖析儒道两家思想传统的意蕴。诚如前文所说，

这篇论文所触及的，正是社会层面的群己关系的问题。蔡先生的研究发现：不论儒家或道家的思想传统，都肯定人生活上的自由是人存在的究竟价值；人要自由则必须节制本能欲望与善用理性作用。这种思想很能反映出中国思想传统对人之作为宇宙主体的肯定态度。

本书析论经济思想的两篇论文是方清河先生的《损有余·补不足——均富的理想》与吴克先生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经济思想中的管制与放任》。这两篇论文共同揭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最终鹄的——均富；同时指出：历代经济政策的转变，一方面固与儒道法三家思想之起伏互有关系，另一方面则又与社会经济政治之外在背景互为因果。历代经济政策虽屡有兴革变化，但儒家学者努力于在管制与放任之间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则大致是一条康庄大道，也最能体现儒学传统的中庸性格，对于身处激变岁月中的中国人具有永恒的启示作用。

